

「持此《金刚经》，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善本部收藏有一套抄写于顺治十七年至康熙元年间的蒙、藏文《金刚经》，

与一般藏地抄写的佛经将抄经人、时间及缘由置于经文最末不同，这套《金刚经》在经文正文之前附有一篇类似序文的文章。

这篇序文为我们提供了此套《金刚经》抄写的确切年代及抄经事件的始末，结合《金刚经》信仰特点与顺治朝宫廷史实，

可以揭示顺治朝宫廷宗教信仰的复杂面貌。

济三途苦

故宫博物院藏顺治宫廷泥金写本

《金刚经》缘起初探

在清代诸位帝王中，顺治皇帝似乎

总带着一种神秘的色彩。从他如何力排

诸兄登上帝位，到其母与多尔袞错综复

杂的关系，再到他本人轰轰烈烈的婚姻

生活。种种如是，顺治皇帝短暂的二十

余年人生给后人留下了太多猜测、探究。

正因如此，自我近代学术甫兴，就有

许多著名学者将目光聚焦到他的身上，

其中最为人瞩目的非顺治皇帝与董鄂妃

的结合及衍生出的顺治皇帝死因谜团莫

属。清史研究先驱孟森先生曾有长文考

证董小宛生平以辨其与董鄂妃实非一人

（孟森《董小宛考》，《心史丛刊》，中华书局，

二〇〇六年，第二〇三—二〇六页），又有《世

祖出家事考实》一文论证顺治皇帝死于

痘疾。（孟森《世祖出家事考实》，《明清史

论著集刊正续编》，河北教育出版社，二〇〇〇年，

第二四五页）杨珍先生的《董鄂妃的来历

和董鄂妃之死》（杨珍《董鄂妃的来历与董

鄂妃之死》，《故宫博物院院刊》一九九四年第

一期），引述档案、考订精详。而陈垣

先生则独具慧眼，从顺治皇帝非病故而

是出家这一流传甚广的说法出发，对顺

治皇帝个人的宗教信仰进行了深入探讨，

马晟楠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副研究馆员，毕业于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亚系印度语言学专
业，主要研究方向为梵藏多语种佛
教文献研究、明清宫廷佛教史及藏传佛
教艺术研究

揭示出顺治皇帝与汉地禅宗的密切关联。

（陈垣《语录与顺治宫廷》《顺治皇帝出家》，《陈

垣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一九八〇年）陈

垣先生的研究作为讨论顺治皇帝宗教信

仰问题的开端，一出即成定论。与所有

顺治朝历史研究类似（顺治朝史实早在雍正

时期就已开始被有意歪曲甚至抹去，今天的紫禁

城中也很难能找到明确且直接与顺治皇帝相关的

建筑、文物等。参见毛亦可《顺治皇帝的孚斋》，

《紫禁城》二〇一八年第一期），实物与史料

的极度缺乏是此类问题研究面临的最大的

难题，研究取得新进展往往有赖新史料



清人绘 福临朝服像轴

绢本设色 纵二七〇·五厘米 横一四三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面世。〔如胡祥雨《吴达海揭帖的发现与〈顺治律〉制定过程新考》，《历史档案》二〇一七年第四期；邓小军《敕住善果旅庵月和尚奏对录》有关顺治出家的重要原始文献》，《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十八卷〕本文正是基于对故宫博物院藏珍贵古籍的详细梳理，在其中发现了汉藏佛教合流产生的

独特文献遗存，可以判定其与董鄂妃丧仪直接相关，同时揭示了顺治朝宫廷宗教信仰的复杂面貌。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善本部收藏有一套抄写于顺治十七年（一六六〇年）至康熙元年（一六六二年）间的蒙、藏文《金刚经》。此套《金刚经》为梵夹装（古

书装帧形式之一，集数页成一摞，上、下用木板相夹，而后用绳索、布带相捆），一部《金刚经》独立抄为一函，含蒙文五十四函、藏文五十四函，共计一百零八函，须知整套藏文《甘珠尔》一般为一百零八函，足见此经规模惊人。经书装帧豪华，原装外包裹上悬挂有木牌，上有墨书满文

阅读链接

◎《金剛經》最早由后秦鸠摩罗什于弘始四年（四〇二年）译出，共一卷。以后相继出现五种译本：北魏菩提流支译《金剛般若波罗蜜经》；南朝陈真谛译《金剛般若波罗蜜经》；隋朝达摩笈多译《金剛能断般若波罗蜜经》；唐朝玄奘译《能断金剛般若波罗蜜多经》；唐朝义净译《佛说能断金剛般若波罗蜜多经》。

「珠宝经」，说明在清宫中此书曾被俗称为「珠宝经」。在故宫博物院文物账目中，这套经书也曾被登记作「珠宝经」。可能正是由于这个模糊的称谓，这套佛经一直鲜为研究者提及（如向斯在《中国宫廷善本》中有专门章节讨论清官善本佛经，专有《金刚经》条，却未提及此套经书），直到最近春花在对论昭圣皇太后组织译写蒙文佛经的文章中，简要介绍了这部《金刚经》的蒙文部分。（春花《论昭圣皇太后下令译写的蒙古文佛经》，《中国藏学》二〇二〇年第30期）而此经的藏文部分还未为

这套《金刚经》中的五十四函藏文

写本为梵夹装，上下夹板木质，髹红漆。其上有阴刻填金八宝纹样。上下内护经板均附五色经帘，上护经板首层黄色经帘上仍以金线织出藏文音写梵文的阿礼嘎礼字（阿礼嘎礼，梵文作 *alikaṭi*，是梵文元音字母和辅音字母的总称。阿礼嘎礼字母是其他语言针对梵文的音译系统）。五色经帘揭开后，内有金质欢门，上嵌珍珠、珊瑚等珠宝。上护经板两侧欢门内绘释迦牟尼佛与佛弟子须菩提，须菩提双膝跪地，侧身向佛，颌首低眉、两手合十，这组形象正表现了《金刚经》须菩提向佛问法的主题，构思巧妙。两欢门间镶嵌凸出的经名《圣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gya gar skad du/ārya vajra cche ti ka nā ma prajñā*），下护经板四欢门内绘四大天王。

经书内页均为磁青纸，金字正反面书写。每页绘制版框，正面版框左右还留有竖栏，分别以蒙、藏文书写页码。经文正文首页版框额外绘有繁复的装饰花纹，格外豪华。经文每页五行，藏文鸟坚体，缮写极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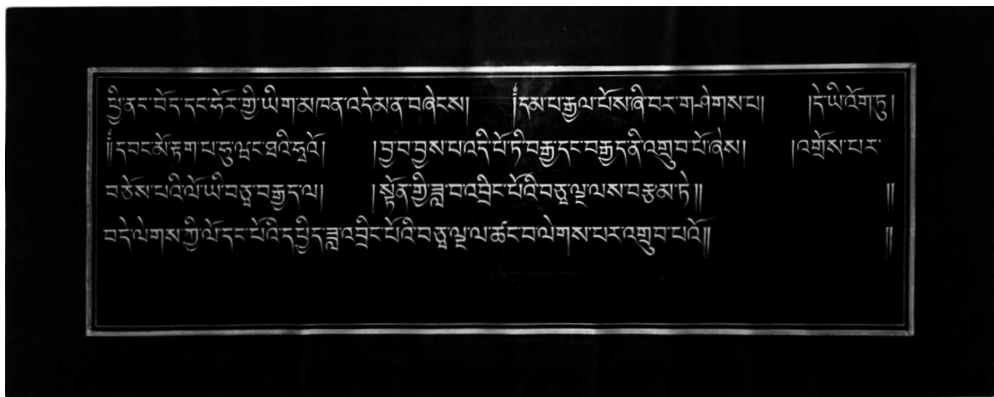
清顺治十七年至清康熙元年 泥金写本金刚经内护经板



清顺治十七年至清康熙元年 泥金写本金刚经
故宫博物院藏



清顺治十七年至清康熙元年 泥金写本金刚经经文首页



清顺治十七年至清康熙元年 泥金写本金刚经藏文序文（部分）

与一般藏地抄写的佛经将抄经人

时间及缘由置于经文最末不同（元、明时期藏文佛经愿文多为跋文，见西热桑布《藏文「元版」考》，《中国藏学》二〇〇九年第一期；熊文彬《元代皇室成员施刊的藏文佛经》，《中国藏学》二〇〇九年第三期；萨吉《意大利帕尔马中国艺术博物馆所藏藏文木刻本佛经》，《中国藏学》二〇〇八年第四期），这套《金刚经》在经文正文之前附有类似序文的文章。我们对此经抄写时间的判断正来源于此，译文如下：

威力如先圣，俊美若帝释，无垢心比功德仙，统天下之顺治皇帝。一切佛说之法典，此为般若波罗蜜多之核心，以空性中所生金刚智慧，断除一切习气的遮盖。顺治十七年，欲以金粉写经书一百零八函，挑选内外藏、蒙（*phyi nang bod dang hor*）笔帖式。先帝驾崩，此后圣母皇太后继续，完成了一百零八函经书。顺治十八年秋月中十五日开始，康熙元年春月中十五日完成。

与蒙文序文相比，藏文序文多出了礼赞顺治皇帝和佛法的数句偈颂。两者所记录的宫廷抄写《金刚经》经过、人物、时间完全相同（参见春花《论昭圣皇太



清人绘 孝庄文皇后像
绢本设色 纵二六二厘米 横一八一·六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后下令译写的蒙古文佛经》)。梳理这个历史事件：顺治十七年，皇帝起意并开始筹备经书抄写工作，挑选人员。抄写工作在顺治皇帝已经驾崩的顺治十八年开始，由圣母皇太后（此圣母皇太后应指孝庄皇太后）主持，于康熙元年完成。

这段序文为我们提供了此套《金刚经》抄写的确切年代，由此可以判断，

它就是著录于《秘殿珠林》卷二十四中的「世祖章皇帝钦命修造镶嵌珠宝磁青笺泥金书西域字金刚经五十四本、蒙古字金刚经五十四本」。《秘殿珠林》卷二十四，故宫珍本丛刊，海南出版社，二〇〇一年）在现存清代宫廷藏文写、刻本佛经中，这是迄今可确定的年代最早的一件，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

在对此套《金刚经》作进一步整理的过程中，一个更为特殊的现象引起了笔者的注意。在这篇叙述抄经时间的序文之后，直接承接的并不是《金刚经》正文，而是一篇类似赞美《金刚经》甚深功德的礼赞并祈请文。节译该文如下：

此《圣能断金刚波罗蜜多经》，为三世诸佛道，相与无相无分别，成就种种诸事业……

欲听闻此《金刚经》，先坚固心意，洗漱无明，再迎请八力士、四菩萨……

迎请青除灾金刚、迎请避毒金刚、迎请黄随求金刚、迎请白净水金刚……

礼敬三界尊、十方佛，我祈请大愿，以《能断金刚经》，报答四恩、除恶趣苦……

佛之甚深法，百千万劫难得，我今得见闻，愿成如来真实意。

检视这段文字，自「欲听闻此《金刚经》」开始至文末，正是汉地佛教写、刻《金刚经》时常附于经前的「金刚经祈请文」：

金刚经启请：
若有人受持《金刚经》者，先须志

心念、净口业真言，然后启请八金刚、四菩萨，名号所在之处常当拥护……

请八金刚：

奉请青除灾金刚、奉请辟毒金刚、奉请黄随求金刚、奉请白净水金刚、奉请赤声火金刚、奉请定持灾金刚……

发愿文：

稽首三界尊，归命十方佛，我今发弘愿，持此《金刚经》，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

开经偈：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意。（《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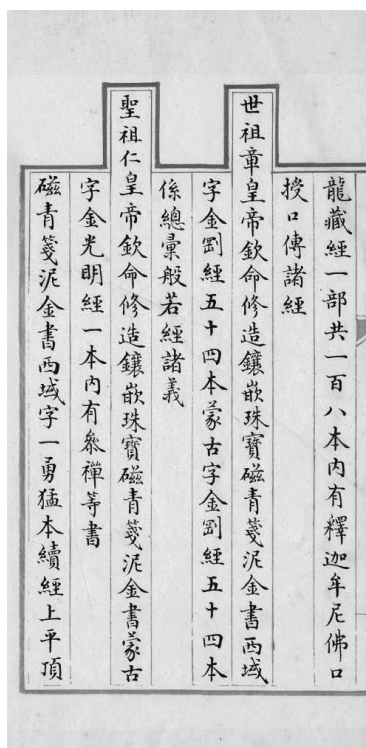
刚经科仪》，《已续藏经》，日本京都藏经书院刊行）

对比汉藏两段祈请文，其丝丝入扣的对应关系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对应汉语「发愿文」部分的藏文在处理上刻意模仿汉语五字一句的句式，造成藏文表达的生涩。由此可见，这篇藏文祈请文系由汉语翻译而成。

抄写、刊刻《金刚经》时附加这类文字，最早的实例见于敦煌汉文文献（方广锠《敦煌文献中的〈金刚经〉及其注疏》，《世界宗教研究》一九九五年第一期）敦煌文献中的祈请文字尚没有特别规范的内容和排列顺序，位置时在经前时在经末（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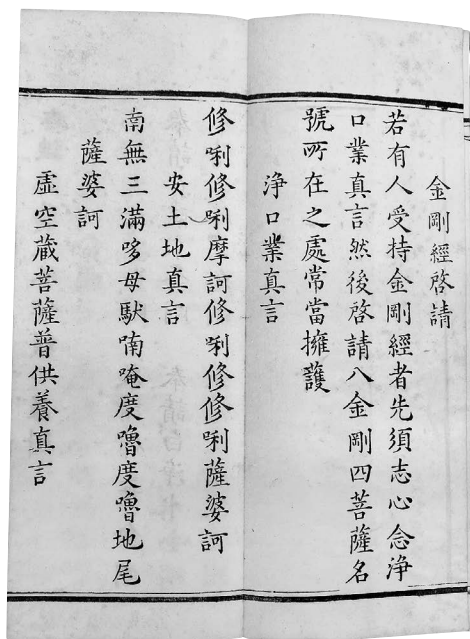
敦煌汉文文献同出的藏文写本中，《金刚经》有无附加上述祈愿文字的情况）。至宋代，「金刚经祈请文」逐渐定型为一个规范的文

本，成为汉地佛教教徒修持《金刚经》时的仪轨指导。（张文卓《宋元明清时期〈金刚经〉的流传及特点》，《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二〇一三年第三期）故此后在汉地刊刻、抄写的单行本《金刚经》前附此祈请文的情况极为常见。（当然在宋以后的历代写本、刻本《金刚经》中，这篇祈愿文不一定会完整引用，有时会截取引用其中某一部分，但这并不影响对其性质的判断，反而更能证明其与经文共生的普遍性。参见侯冲《敦煌不孤——以〈金刚经纂〉为例》，《佛教文献研究》第三辑，



《秘殿珠林》卷二十四内页

此处记载：“世祖章皇帝钦命修造镶嵌珠宝磁青笺泥金书西域字金刚经五十四本、蒙古字金刚经五十四本。”



清康熙三十二年 刻本金刚经祈请文
故宫博物院藏

二〇一九年) 这篇文章是汉地佛教徒自行编撰而成, 反映的是道地的汉地佛教思想。(《佛说金刚经纂》, 方广锬主编《藏外佛教文献》第一辑, 宗教文化出版社, 一九九五年)

而除了这部顺治写本《金刚经》前所附的藏文译本外, 笔者还没有找到能与之完全对应的其他藏文文本, 故我们可以较为肯定地说, 这篇祈请文的藏译是为此次抄写一百零八函《金刚经》特意为之的。在藏文《金刚经》前附加这篇文字的藏译, 并非出于藏地传统, 是清早期宫廷汉藏佛教文化共存共生、相互影响的最好证据, 也是解释顺治皇帝发愿抄写此套经书原因的最关键证据。

《金刚经》在汉地佛教中拥有崇高的地位, 从教理而言, 《金刚经》属于宣说佛教根本解脱智慧的般若经部。佛陀于四处十六会宣说《大般若经》, 十六会又可分根本般若与杂般若, 《金刚经》即为杂般若中最重要的一部, 其内容为佛弟子中「解空第一」的须菩提向佛问法, 佛为其宣说缘起性空的解脱法门, 最终令人起信、解, 并教人以方便般若。汉传佛教译经史上, 《金刚经》凡六译, 译者包括鸠摩罗什、真谛、玄

阅读链接

《大般若经》与《金刚经》

◎ 《大般若经》, 全称《大般若波罗蜜多经》, 为宣说诸法皆空之义的大乘般若类经典的汇编。般若为宗教术语, 意为“终极智慧”、“辨识智慧”, 专指如实认知一切事物和万物本源的智慧。

◎ 《大般若经》由唐代玄奘翻译, 共六百卷, 因其是佛祖历经十六次集会之讲说而完成, 每一次讲说即是一种经典, 故《大般若经》分为十六种经典(即十六会)。十六会中, 第一会说于鹫峰山, 有四百卷; 第二会至第六会, 亦说于鹫峰山, 包括自第四〇一卷至第五七三卷; 第七、八、九会, 则说于给孤独园, 包括自第五七四卷至五七七卷; 第十会, 说于他化自在天宫, 为第五七八卷; 第十一会至第十四会, 说于给孤独园, 包括自第五七九卷至第五九〇卷; 第十五会, 说于鹫峰山, 包括自第五九一卷至五九二卷; 第十六会, 说于白鹫湖畔, 包括自第五九三卷至六百卷。其中第九会即为《金刚般若》, 也就是《金刚经》。

奘、义净等在内的历史上最为著名的译师, 他们对此经的反复翻译足见其重要程度。而在民间信仰层面, 念诵、抄写刊刻《金刚经》被认为可以获得极为殊胜的功德。从现有的史料可以确知, 早至南朝萧梁时代民间就已有普遍的持诵、

传播《金刚经》可获功德的观念, 隋唐

时期出现了专门记录《金刚经》灵验果

报的《金刚般若经灵验记》等文献(《金

刚般若经灵验记》为由后梁入唐的萧瑀编著, 萧

瑀其人于《旧唐书》卷六十三有传。《灵验记》

原书已散佚, 散见于唐孟献忠《金刚般若经集

记》及《法苑珠林》《太平广记》等处。参见邵

颖涛《萧瑀〈金刚般若经灵验记〉文献辑佚》, 《中

国典籍与文化》二〇一一年第四期), 其中以

段成式《金刚经鸠异》最为著名。【唐】

段成式《金刚经鸠异》, 《酉阳杂俎》续集卷七,

齐鲁书社, 二〇〇七年) 入宋后, 《太平广记》

《夷坚志》等文学作品集中记载有大量

《金刚经》灵验故事。元明清《金刚经》

灵验类文献编撰不断(何佳玲《明清〈金刚

经〉灵验记之研究》, 台湾中正大学学位论文),

可以说, 崇奉《金刚经》产生果报的思想,

已经深深进入汉地传统的因果报应体系

中, 为人广泛接受。(郭映翠《〈金刚经〉

与中国古代报应观》, 《长治学院学报》二〇一

六年第一期)

与持诵《无量寿经》祈祷长寿、持

诵《阿弥陀经》祈愿往生极乐世界类似,

汉地信徒们崇奉《金刚经》所期待产生

的果报同样具有很强的指向性, 即为亡

唐咸通九年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首祈請真言（局部）
英國國家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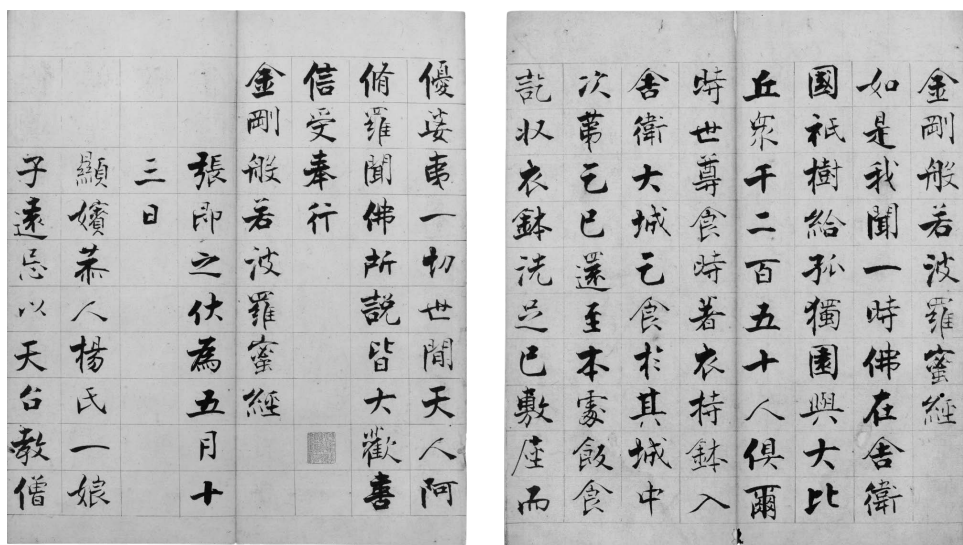
者追荐冥福、甚至达成起死回生的神迹。

《太平广记》「报应门」中记载的高邮县丞李丘一暴卒还阳的故事最具代表性，李暴卒后「入冥间见阎王，王曰：曾作何功德？云：惟造《金刚经》一卷。王即合掌云：冥间号《金刚经》最上功德，君能书写，其福不小……」遂令其返回人间。故事通过冥王之口，表达了《金刚经》在冥界的至高地位，死者甚至可以因为抄写过一部《金刚经》就得复生。更为严苛的是，对亡者而言，亲人为其持诵其他经典是无法取代《金刚经》的。《金刚经》载唐大和五年（八三一年），汉州人王翰暴卒三日而复活，他叙述了在冥界见到亡兄，得知其生前曾杀牛、狗，如作功德可以免死籍，「翰欲为斋，及写《法华经》《金光明经》，皆曰：不可，乃请曰：持《金刚经》七遍与之。其兄喜曰：足矣。及活，遂舍业出家」。在小说《金瓶梅》中，李瓶儿请尼姑在家举办金刚经忏道场，潘金莲私下抱怨：又无人死，做这些作甚么。可见举办《金刚经》相关的仪轨一般出现在丧事活动里。正因为《金刚经》具有如此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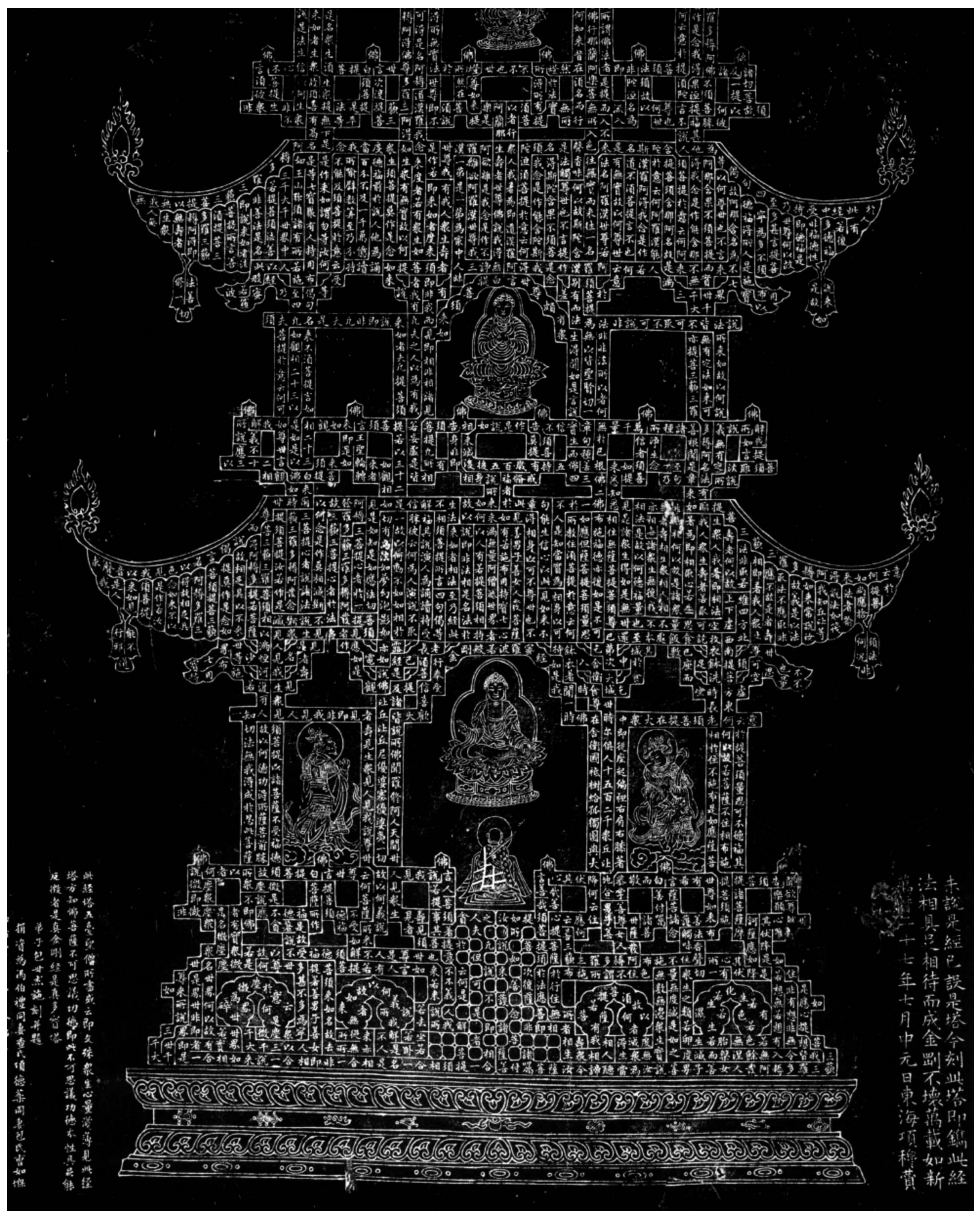
胜的功德，存世文献中大量的汉文《金

刚经》是为亡者所造。举其要者：敦煌写本 S.7236 是一件书品极佳的唐代宫廷写经，内容为「敬造《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三千部愿文」，发愿者正是大名鼎鼎的武则天，她在其母杨氏亡故不久即将其故宅舍宅为寺，并发愿于寺中抄写《金刚经》三千卷为其亡故双亲祈福，远至沙洲的佛寺都得到了此次抄经的恩赐。（方广锠《英国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录》（斯 6025、8400 号）》，宗教文化出版社，二〇〇〇 年；赵和平《武则天为已逝父母写经发愿文及相关敦煌写卷综合研究》，《敦煌学辑刊》二〇〇六年第三期）故宫博物院藏南宋著名书法家张即之的楷书《金刚经》册，其自题明确称为「显嫔恭人杨氏一娘」即为其亡妻所书，以资冥福。（「显嫔」出自《礼记·曲礼》，「生曰妻，死曰嫔」）一九七五年发掘的明末著名收藏家项元汴家族墓，其中「大房」棺上覆盖《金刚经》经塔拓片一张，有项元汴之子项穆题赞。（陆耀华《浙江嘉兴明项氏墓》，《文物》一九八二年第八期。嘉兴博物馆《明器载道：嘉兴博物馆馆藏文物·明墓古器》，中华书局，二〇一

南宋 张即之 楷书金刚经册(局部)
纸本墨笔
故宫博物院藏



明 项氏墓金剛經拓片(局部)
嘉兴博物馆藏



六年)可见为亡人准备《金刚经》，不管从理念到实践，都是汉地佛教延绵千载的传统。

顺治皇帝约在顺治十四年(一六五七年)开始接触木陈忞、玉林通秀等禅师，后倾心于禅宗教理，频频听法参禅，这些史实在《茆溪语录》《北游集》等释家语录及清人笔记中都有许多细节记录。这些僧人中，玉林通秀禅师是顺治皇帝最为倚重、受教最多之人，顺治皇帝的法号「行痴」即为玉林所定。两人初见于顺治十五年九月，顺治十六年玉林因母丧南归，顺治十七年顺治皇帝遭遇郑成功攻陷南京、董鄂妃病危双重打击，处于精神崩溃边缘时急召其回京，命他为京城一千五百僧人授大戒(授予比丘、比丘尼之资格)，随后封其为「大觉普济能仁国师」，玉林禅师一直陪同顺治皇帝至其驾崩。根据玉林禅师语录所载，顺治皇帝曾向他求问参究用心之方，他做《功夫说》以教，其中就有引用《金刚经》讲「无住为住」、「随缘任运」、「转识成智」的内容。(任宜敏《玉林国师禅学

思想析论》，《浙江学刊》二〇〇二年第五期)

故不论从师承受教的角度，还是从一个近于狂热的宗教信徒角度，我们推测顺治皇帝熟知《金刚经》的内容和持经功德大抵是没有问题的。

顺治十七年八月，宠冠后宫的董鄂妃去世，皇帝悲痛欲绝。顺治皇帝亲自撰写了《端敬皇后行状》，其中详细记录了董鄂氏从不信内法，在自己的影响下逐渐专心禅学，与他共参话头，最终「端坐呼佛号，嗑气而化」。特别是董鄂妃嘱咐左右「我逝后，来体者慎毋以华美。皇上崇俭约，如用诸珍丽物，违上意，亦非我素也。曷若以我所遗者为奉佛诵经需，殊有利耳」。说明董鄂妃自己已有明确地以财物布施佛法的意愿。为董鄂妃举办的追荐道场设置在景山，遵循的都是汉地水陆道场的仪轨，设置了金剛坛、梵网坛等，日夜念诵、烧施。依照前引经序文，我们讨论的这部《金刚经》是顺治十七年动意制作，没有交代具体月份。这一年仅挑选了写经人员，真正开始缮写已在顺治十八年秋，

完成于康熙元年春，工程耗时约半年。

顺治皇帝驾崩于顺治十八年正月，如果他是在十七年上半年已开始动意写经，那么以半年为期计算，其驾崩前完成抄经工作都是完全可能的。(当时《金刚经》经文本文已有完整的蒙、藏文译本，需要当时翻译的仅有经序文和祈愿文，故用时不会太长)唯一合理的解释，即顺治皇帝是在董鄂妃八月逝世后起意为亡妻写经，最终成为皇帝的遗愿，由孝庄皇太后实际主持完成。如果以此视角，抄写这套《金刚经》对孝庄皇太后来说，更是对儿子福临的追荐祈福，这大概也能解释为何序文首先礼赞了顺治皇帝，却全文完全未提及董鄂妃一事。

至此，本文从文本分析入手，找到故宫博物院藏顺治泥金藏文写本《金刚经》深受汉传佛教影响的确切证据，以此出发，结合《金刚经》信仰特点与顺治朝廷史实，论证此经抄写缘起实为顺治皇帝为董鄂妃祈求冥福。以此观点求教于方家，为这件为史家津津乐道的谜案提供些许实证。❶